

编辑学者化与编辑引领学术： 两样的赋能，一样的迷思^{*}

朱 剑

(南京大学 学报编辑部, 江苏 南京 210000)

【摘 要】学者化和引领学术除了皆是学术期刊编辑的自我赋能,在更深的层面上还有更多共同之处:主体都是因编辑职业化而告别学者身份独立掌控了学术期刊的编辑,都面临着自身身份和与学者关系的重建,学者化和引领学术既是身份重建的目标、也是与学者关系的基础,反复言说,不仅是自我激励,更是让学者接受其设计的新关系的游说,故而都将已是事实的、对学术期刊的独立掌控作为言说的依凭,并视之为新身份、新关系不可变更的前提。实际上,两者构建的新身份和新关系不仅起点相同,看似不同的目标,指向也是一致的,学者化不会是终点而只能是阶段性目标,它的逻辑结果必然是引领学术,故而与其说殊途同归,不如说原本就是同路人。从各自所立的“flag”皆无法逻辑自洽可知,这是一条永远也无法抵达终点的路,故而唯有走出学者化和引领学术的迷思,回归学术共同体,才是编辑和掌控于其手中学术期刊的根本进路。

【关键词】编辑学者化;引领学术;学术期刊;编辑职业化;编辑身份

【中图分类号】G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23)01-0031-10

DOI: 10.14091/j.cnki.kmxyxb.2023.01.004

“编辑学者化”和“编辑引领学术”这两个话题,自它们问世至今,始终保持着一定的热度,进入21世纪以来,在学术期刊编辑^①群体中,更是经常响起。这两个声音,说的虽然都是编辑要如何如何,但字面上的意思却差异很大。学者化比较低调,谋求的似乎只是编辑能与学者一样具有专业学问,从而得以一种独立身份与学者平等地存在;而引领学术的调门则不可谓不高,要的是编辑登高一呼学界景从的盛大气象。正是这种明面上的差异使得最初讨论的圈子各有不同,很少交集,热衷于学者化话题的大多是在学术界被认为或自认为影响不大的中小期刊,尤其是在高校综合性学报中,这个从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的话题在21世纪以来似乎仍然受到编辑们欢迎;学术期刊引领学术这一话题已难以清晰地溯源,但由此衍生出的编辑引领学术话题并引发热议则比学者化要晚了十多年,直到21世纪初才常听人提起,炒热这一话题的是在学术界受到热捧的少数几家名刊大刊,比如《中国社会科学》以及部分知名的省市社科院社科联主办的综合性期刊的主编们。

但是,近些年来,这两个内容不一、圈子也不同的话题却在不断地讨论中发生了一定的交集甚至重合:坚持学者化的期刊编辑中出现了也将引领学术视为自己目标的,而努力引领学术的编辑则将学者化纳入跃升引领境界的可行路径。显然,随着讨论的深入,一定是有越来越多的共同之处被两个圈子中人都发现或体会到了,于是,慢慢地从过去的互不交集到了如今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要说两者是怎么走到一起的,最直接的动因当然是,不管大刊小刊名刊普刊,编辑们都不甘现状,积极励志,勇于突破自我使然。无论是学者化还是引领学术,两者最直观的共同之处就在于,都是心怀理想目标的编辑的自我赋能,如今的重合,也可视为殊途同归吧。那么,除了自我赋能外,使编辑学者

^{*} 【作者简介】朱 剑,男,江苏靖江人,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审,研究方向为学术期刊与学术评价。

^① 为行文方便,以下除非特指,凡言及“编辑”,一般都包括“主编”;凡言及“主编”,则指担任包括高校学报在内的学术期刊主编或总编职务者。

化和编辑引领学术这两个原本似乎各异其趣的话题最终殊途同归的,还有没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要回答这问题,我们不妨对两者做一些稍稍深入的比较,看看到底有何异同,所异之处是否截然对立,所同之处能否构成同归的基础,大概就能从中找到答案,而且,或许还可以有更多的收获。本文试着比较一下,不当之处,还请编辑同行和方家不吝批评。

一、两者的主体都是外在于学者群体的编辑,不同的只是修炼的目标

学者化的主体是编辑,这从该话题在学术期刊界甫一揭开就是很清楚的。学者化的话题并非源起于期刊界,而是最先出自作家王蒙,他在1982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了“我们不重视作家的学问基础,我们的作家队伍明显地呈现出非学者化的趋势”^①的问题,很明显,所谓作家的“非学者化”就是缺失了“学问基础”,所以,“学者化”就是一个补齐学问基础的过程。王蒙的呼吁得到了戏剧、美术、教育等各界的呼应,很多文化行业都提出了类似补齐学问基础的学者化主张。此时,不管哪个界别的学者化,都是特指该行业的专业工作者补齐因“文革”等耽误了的本该具备的文化知识。

学者化的主张也得到了出版界和学术期刊界的响应,但其含义开始出现变化。1984年,湖北人民出版社胡光清首提编辑学者化的主张,他比王蒙进了一步,在他看来,编辑学者化不仅要补齐学问基础,编辑更要对“学科中某一分支,有治学成为专家的企望”,所以,他把专业化与学者化并提,或者说他把编辑的专业化称为学者化。^②4年后,苏州大学学报编辑部王英志以《学报编辑学者化略论》为题,率先在学报界也是学术期刊界提出了编辑学者化的话题,并更进一步地将学者化的标准提高到了“对某一门科学具有颇深的造诣”,这就不仅仅是专业化,而是要在某一专业超越一般学者,成为头部最优秀的那些人中的一员。^③王英志的呼吁得到了学报界热烈的反响,赞同者纷纷撰文呼应,学者化很快成为学术期刊界特别是高校学报界最热门的话题。在1992年召开的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研究会理事长《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主编杨焕章先生在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我们学报工作者都应当迅速学者化……编辑队伍学者化是一条必由之路。”^④

但是,对于编辑须拥有与优秀学者一样高超的专业学术造诣的“必由之路”,部分中小学报的编辑觉得不免有些强人所难,于是起而反对,颇为激烈的争论由此展开。这使得杨焕章稍稍改变了说法:“‘学者化’是一个方向。我认为,每一个学报编辑都应当朝着这个方向努力,都应当成为学者。”^⑤不管是必由之路,还是发展方向,都使得在各行各业中只是针对特定时期特定问题的一个特定做法成了学术期刊特别是学报编辑长久的追求。可见,自编辑学者化的话题提出后,尽管其具体内容有了些变化,但这一行为的主体始终都是外在于专业学者群体的编辑,则是没有疑问的。

引领学术的主体是谁?这在热议刚起时并不清晰。率先引出这一话题的是《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孙麾,2004年4月,他在一篇文章中是这样说的:“学术期刊不能仅仅满足于尽量发表水平高的学术成果,它同时还要自觉担当起学术组织和学术引导的重任。”^⑥接着他又说了学术期刊编辑在其中的作用,文章虽然将“学术组织和学术引导”的重任指给了学术期刊,不过,编辑参与甚至主导“引领”的意思也已表达得比较清楚。此后参与讨论的主编们就没有这么含蓄了,同年9月,时任《河北学刊》主编田卫平在接受媒体记者关于谁是学术引领者问题的采访时即直言:是“学术期刊的从业者”而不是学者,充当了“学术发展‘引领者’的角色”,而这个“从业者”,当然就是主编和编辑们了。^⑦

① 王蒙. 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谈我国作者的非学者化 [J]. 读书, 1982, (11): 17-24.

② 胡光清. 试论编辑的专业化与学者化 [J]. 编创之友, 1984, (2): 76-82.

③ 王英志. 学报编辑学者化略论 [J]. 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8, (3): 115-118.

④ 杨焕章. 努力开创学报工作的新局面 [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1993, (1): 108-116.

⑤ 杨焕章. 论学报编辑学者化的必要和可能 [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1995, (6): 107-111.

⑥ 孙麾. 学术期刊的使命 [N]. 光明日报, 2004-04-29 (C1).

⑦ 田卫平. 学术媒体与引领学术发展 [N]. 社会科学报, 2004-09-02.

也许由主编直言不讳地宣称自己所属的群体是学术引领者，而且学术引领者只能归于这个群体的说法太过惊世骇俗，一经提出，就遭到质疑，在期刊界内部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与学者化最早的质疑来自中小学报的编辑不同，对编辑引领学术最有影响的质疑和批评则来自刚由学者转行当主编但并未放弃教授身份的几位著名学者，而且他们的言词颇为尖锐，比如，刚出任《中山大学学报》主编不久的吴承学教授就以《编辑莫妄谈“引领学术”》为题针锋相对地指出：“编辑对作者绝不能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心态，不要妄谈‘引领学术’，而是要敬畏学术，理解学术，服务学术。”^①刚出任《四川大学学报》主编的原祖杰教授的指责更不留情面：“职业编辑无视学术研究基本规律而单方面强调期刊引领学术，不仅颠倒了期刊与学术群体之间的关系，所透出的还有学术期刊对其所依归的学术共同体的傲慢。”^②

当类似的批评逐渐多起来后，同样主张编辑引领学术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柯锦华做出了回应，她指出，并不是所有的编辑都是天然的引领者，而是需要一番提升境界的修炼，她特地阐述了这一境界提升的过程：“从‘旁观者’到‘参与者’再到‘引领者’，标志着学术期刊编辑办刊理念的成熟和办刊境界的提升，意味着其编辑思想的自我超越与主体意识的自觉。一流学术期刊编辑有勇气有能力不断超越自己，不断接近学术引领者的最高境界和理想目标。”^③与杨焕章将学者化确定为学报编辑的目标一样，柯锦华其实也将引领学术确定为有志提升自身境界的编辑的理想目标。当然，经过这样的论证，不管是事实主体，还是目标主体，引领学术的主体都是学术期刊编辑了。

学者化和引领学术的主体虽然都是编辑，虽然两者都经历了由对现实理应如此的描述转换成对理想目标的设定，但主体通过行动而可能达成的目标境界还是有高下之分的。在引领学术持论者看来，学者化还没有达到编辑的最高境界，大概只相当于柯锦华所说的“参与者”，但既然承认“参与者”是臻于编辑化境之前的一个台阶，也就为日后将学者化持论者引为同路人埋下了伏笔。

二、两者所要确立的都是编辑与学者的关系，不同的只是编辑的位份

如前所述，编辑学者化的话题发端于王蒙号召作家要学者化的一篇文章，针对的是特定时期的特定问题，虽然得到了各界热烈呼应，但需要学者化的毕竟主要是被“文革”耽误而缺失了学问基础的一代人，时过境迁，随着各界中受过系统教育、具备了学问基础的新人不断涌现，这个话题也就渐渐地沉寂下去了。所以，说得更直白一点，学者化就是一次填坑行动，填上此前挖下的大大小小的坑，尤其是“文革”挖下的这个大坑，坑填平了，也就过去了。但唯有学术期刊界，自揭开这个话题至今，虽然高学历的新人可谓辈出，可这个坑却似乎永远也填不平，学者化仿佛成了编辑的宿命，在被议论了三十多年后，还是看不到终点究竟在何处。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编辑学者化与其他行业的学者化相比内涵已有所增加，另一方面则在于学者化讨论是有未能了结的“前传”的，若从“前传”那里接手后一时仍未能将问题了结，可不得持续讨论下去？这个“前传”，就是编辑与学者关系的重建。

随着“文革”结束后学术研究的恢复，学术期刊数量不断增加，编辑队伍不断壮大，以前那种编研一体的状况逐渐为职业编辑所替代，从学者队伍中分离出来的学术期刊编辑告别了学者身份，必然面临身份重建问题，而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重新定位其与学者的关系。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一批从学者转行而来的学报前辈就这一新关系的构建付出了很多心血。山东大学《文史哲》主编刘光裕先生提出：“编辑是作者和读者这两者关系的中介”，编辑对于作者及其作品和读者具有引导、协调和净化作用；^④《复旦学报》主编王华良先生提出：编辑对作者作品的看似带有依附性的劳动其实质是精神再生产，具有“一种独特的创造性”^⑤。随着讨论的深入，参与者日益增多。又有多位学报编辑共同提出了“编辑主体

① 吴承学. 编辑莫妄谈“引领学术”[N]. 光明日报, 2009-06-22 (06).

② 原祖杰. 学术期刊何以引领学术[J]. 澳门理工学报, 2014, (1): 113-124.

③ 柯锦华. 学术期刊编辑三境界：从旁观者到引领者[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3-07-12 (A06).

④ 刘光裕. 论编辑与作者和读者的关系[J]. 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5, (6): 113-118.

⑤ 刘光裕, 王华良. 编辑学论稿[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9: 56, 85.

说”，主张在与作者（学者）的关系中，编辑应通过对审稿等关键性程序和对学术媒体的掌控，摆脱对学者的依附，确立起相对于学者独立的主体地位。这样的关系构建无疑对仍在不断壮大的学报编辑队伍特别是没有学者经历的青年编辑更具吸引力，所以为更多的学报编辑所接受。

但是，对于编辑与学者的关系，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明显依附于学者的“编辑中介说”和“编辑再创造说”，还是80年代中期不再依附于学者的“编辑（独立）主体说”，要在现实中成立，编辑都必须具备很高的学术能力，而且，越是强调编辑的独立性，对编辑学术能力的要求就越高。如果找不到一条使远离科研一线和外在于学者群体的编辑迅速提升学术能力的可靠路径，那么以上这些编辑与学者关系的设计都不免成为空中楼阁。当王英志以“对某一门科学具有颇深的造诣”为标准提出学报编辑学者化时，似乎恰好为作为独立主体的编辑与学者关系的构建指明了一条路径，故而学报编辑学者化话题的揭开可谓恰逢其时。由此，编辑学者化话题的魅力也就充分地显现出来了：与其说它是学报编辑的理想目标，不如说它是一条通往理想目标的可靠路径，虽然它不是学报编辑与学者关系构建本身，却为编辑所希望构建的关系模式的实现提供了可能。

如果说编辑学者化是在间接地重新构建不同于传统“编研一体”的编辑与学者关系，那么，编辑引领学术对两者关系的重新构建则是直接的。比起学者化来，这样的重建也许更不容易，因为首先要证明，学术是需要学术期刊引领的；其次要证明，学术期刊的编辑是有能力引领的；最后还要证明只有编辑才具有这样的能力。第一个证明的难度相对较小，因为在历史上不乏期刊成功引领学术获取丰硕研究成果的先例，可以信手拈来；后两者的证明难度就大多了，尤其是最后者。所以，持论者都是从学术期刊的使命或基本功能入手，先易后难。

如前所述，孙麾和田卫平都指出了学术期刊除了展示学术成果的功能外，还具有“学术组织和学术引导”的功能和使命，^①“引导推动学术研究向着规范、健康、繁荣的目标迈进”^②。接着就是对编辑为什么能以及为什么只有编辑能的证明了。田卫平采取了先抑后扬的论说方法，先自认，“如果就某一领域、某一问题上说”，学术期刊编辑不可能比得过专家，然后话锋一转，“期刊编辑的‘万金油’角色”，使他接受的学术信息比较多，受到既定框框制约比较少，而且还知道专家在研究思考什么，读者需要什么，加上他的职业技能，就能生成新的学术热点，从而让“学术期刊所起的‘引领’功能凸显无疑”，而所有这些，“专家是做不到的，因为他的专业和角色是有局限性的”。^③柯锦华的论证则是作了另一番铺垫，她在第四届全国综合类人文社会科学期刊高层论坛的发言中将学术期刊的功能分成了3个层次：第一是“展示学术思想的窗口”；第二是“搭建有序的思想碰撞的平台”；第三是“自觉主动引领学术”。强调只有“一流名刊”才能“综合发挥上述不同层次功能”。^④所以，她的论证更有将引领学术作为编辑当努力实现的目标的味道，即先一流，再引领。不管是指向现实还是未来，编辑与学者之间引领与被引领的关系在纸上还是被构建起来了。

学者化和引领学术虽然都以重建编辑与学者的关系为己任，但在各自构建的这一关系中，编辑的位份还是有明显差别的。学者化似乎充其量也只是与学者平起平坐，而所谓引领学术，其实也就是引导学者做什么学术和如何做学术，很有些导师居高临下高屋建瓴指点江湖的味道。平起平坐也好，居高临下也好，实际上都是从两个互有关联又互相独立的群体出发，将自己或学者中的一方置于相对弱勢的“他者”位置，不同的只是坐在“他者”位置上的人。

① 孙麾. 学术期刊的使命 [N]. 光明日报, 2004-04-29 (C1).

② 田卫平. 学术媒体与引领学术发展 [N]. 社会科学报, 2004-09-02.

③ 田卫平. 重“展示”轻“引领”：学术期刊发展的缺位 [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63-64.

④ 本刊编辑部. 办好学术期刊 繁荣社会科学——第四届全国综合类人文社科期刊高层论坛综述 [J]. 云南社会科学, 2005, (1): 132-136.

三、两者都是以编辑对期刊的掌控为依凭，不同的只是依赖的程度

编辑学者化持论者依凭的是什么？或者说他们有什么特别依凭没有？这样问也许有人会质疑，学者化无非是编辑努力提升自己的学术素养和能力，除了时间、毅力、机会以外，还需要什么特别依凭？的确，如果仅仅是提升自己，有这些差不多就行了，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依凭，但如果学者化还承载了超越提升学术素养和能力范畴的其他愿望，比如试图通过学者化重建与学者的关系，确立起编辑独立于学者、与学者平起平坐的地位，并让学者接受这重建的新关系，那么，有所依凭就会顺利和容易许多。所以，当话题揭开不久后学者化讨论的重心逐渐从提升编辑的素养和能力向提高编辑的地位转移时，参与者很自然地就会问自己：凭什么来证明和支撑自己相对于学者的独立且平等的地位？更关键的，凭什么来说服学者接受这样的关系？

答案是现成的，这一依凭，就是编辑手中掌握的审稿权，这一权力的存在，提供了编辑学者化必要性和可能性的证明：编辑要构建与学者平等的地位且让学者接受，就必须掌握独立审稿权；编辑要掌握独立审稿权，就必须学者化。对此，学者化持论者从不隐讳。“学报乃学术刊物，学报编辑学者化理所当然，势在必行。”这是因为“学报编辑乃是科学事业神圣而至诚的法官”“每天做着‘文以择优，人以拔萃’的工作”，而学者化“会大大地增强编辑自身实力，使其在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对稿件处理自然会成竹在胸，高屋建瓴，练就一副较高的学术观察、评价、判断的慧眼”。^①透过华丽的辞藻，我们不难看出学者化持论者对审稿权的倚重。

与此相比，杨焕章说得更接地气：“从道理上说，审稿人的水平在稿件所涉及的问题上应当略高于撰稿人的水平，否则，从何审起……一个称职的学报编辑，应当能够独立地制定选题计划，应当能够独立地鉴别稿件，应当能够独立指出稿件的不足以帮助提高稿件的水平，应当能够跟作者就稿件进行磋商。这些都是最起码的要求，而这每一项要求都需要编辑成为相应专业的专家学者。”^②这里的3件需要编辑“独立”做的事，无一不与作者（学者）相关：选题是为作者策划，审稿对象是作者的稿件，因自身不需要帮助的还是作者，核心则在审稿，因为审稿是让作者（必须）接受编辑“帮助”的前提和保证。只要编辑能独立地把好审稿关，在与作者（学者）的关系中，不仅能独立、平等，而且不是有可能超过学者，因为编辑提供的不仅是服务，更是对“提高稿件水平”的“帮助”，而受助者总是相对弱势的一方。当然，这就需要编辑具有高超的独立审稿能力，可这又从何而来呢？没有能力，如何行使审稿权力？在杨焕章看来，除了学者化，独立审稿能力的获得难道还会有其他途径？

从这样的论说中不难看出学者化与独立审稿权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和重要，两者的关系实际上是互为依凭：在握的独立审稿权增加了学者化的底气，而学者化则对独立审稿权的维系提供了保证。

如果说，编辑学者化还可以视为一种求诸自己的励志行为，尽管直奔与学者关系重建而去，但并不需要学者的直接参与，至于学者接受与否，并不真正影响到学者化的进行；那么，编辑引领学术就不是这样简单了，学者的参与不仅必不可少，而且学者作为被引领者的角色也是确定了的。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凭什么让学者心甘情愿地被引领的角色接受或配合编辑的引领？所以，作为引领者的编辑，要想成功引领学者，能够让学者臣服的依凭是必不可少的。最好的依凭当然是学者信服其学术引领能力，放心地跟着编辑走。但连从学者转行过来当了主编的教授都不认同，还在学术界中的教授们当然就有更多的不服了。比如，就有媒体记者以学者代言人的身份向田卫平提出过尖锐的问题：“编辑不过是个‘万金油’，怎能比专家知道得更多、更何况要来引领专家的学术发展方向呢？”^③所以才有了我们前面已提及的田卫平关于“万金油”为何能的一段回答。但这样的回答可能田卫平自己也觉得太过单薄，他也意识

① 都媛. 学报编辑学者化之我见 [J]. 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 (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0, (1): 72-75.

② 杨焕章. 谈谈学报编辑学者化问题 [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4, (6): 124-128.

③ 田卫平. 学术媒体与引领学术发展 [N]. 社会科学报, 2004-09-02.

到,要让学者服,那只有从学术以外去寻找依凭了。

好在跟学者化一样,答案也是现成的,只不过不仅仅是编辑手中的审稿权,而是包括审稿权在内的编辑对学术期刊的完整掌控权。之所以要做如此扩展,是因为审稿权毕竟只是一个依附于学者的权力,这里的依附,说的是没有学者写稿在先,就不会有编辑审稿在后。一般说来,审稿并不能直接指挥学者写什么和怎样写,而只是对已写成的稿子的评价,所以,审稿这种权力大多是被动行使的。当然,编辑可以通过审稿意见的反馈来影响作者对稿件的修改,甚至影响作者下个研究课题的选择,但要如此实现引领,既费时间,影响的面也极有限(审稿意见一般是不会公开的),效率实在太低了。但一旦编辑将掌控权扩展到整个学术期刊,立即就不一样了。

对此,作为引领学术持论者,田卫平也是直言不讳的:“在信息化社会的背景下,学术期刊的发言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因而它具有专家们所不具有的话语权,能够影响受众、打动读者。”这里的“话语权”指的就是对期刊的掌控权,或者说与掌控权是一体两面的,而这里的“学术期刊”实际上就是编辑。当然,他也不知道权力是一把双刃剑,“‘话语权’在现代社会具有多种用途,学术期刊既可以用它来作为‘助推器’,引领推动学术朝着科学、规范、健康、繁荣的方向发展;也可以作为‘灭火器’,遏制、扼杀学术理论或观念的创新;还可以作为‘炒菜锅’,把一些‘伪问题’添加佐料后‘炒作’,造成虚假的繁荣。”如何防范风险呢?“学术期刊如何把握好‘引领’的尺度,既需要倾听各领域专家的意见,也需要自身不断的探索和实践。”^①即使如此,专家还是只能处于被咨询的地位,期刊还得牢牢地掌控于编辑之手。

编辑要通过学者化或引领学术来重建与学者的关系,都需要借助自身学术能力之外的权力因素,即对学术期刊的掌控权,不同的只是依赖的程度。学者化只求与学者的对等,故而握有独立审稿权即足矣,而引领学术则对期刊掌控权有着深度依赖。

四、两者都是根源于单位制和编辑职业化,不同的只是单位的地位

编辑学者化的话题之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与学术期刊体制于这一时期确立是相关联的。学术期刊体制确立有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②它有两个不同于传统的鲜明特点:一是办刊的单位制,办刊主体是单位而非学术共同体,行政权力部门掌控了学术期刊的准入、退出和日常管理;二是学术期刊编辑的职业化,中断了编研一体的传统,封闭了编辑与学者自由切换身份的通道。如此一来,就形成了两个不同于传统的结果:一是编辑与学者的关系发生重大改变,编辑不再是学术共同体的一员,必须脱离(放弃)学者身份,成为不同于学者的职业出版人;二是学术期刊与学术共同体的关系发生重大改变,不再内嵌于学术共同体,共同体事实上也失去了自主创办和管理学术期刊的权利,学术期刊编辑由代表学术共同体意志转而向行政权力负责,并由此获得体制授予的对学术期刊的独立掌控权。

这样的后果对于当时的编辑特别是高校学报编辑来说,是欢喜远大于忧愁的,事实上,他们中最有影响的几位,都直接参与了高校学报体制的设计,标志着高校学报体制最初定型的教育部《关于办好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的意见》(1978年11月15日)的起草者中,就有数位当时知名高校学报的主编。正是在这个意见中,高校学报的性质被确定为“以反映本校教学科研成果为主的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该意见还规定:“按文、史、哲、经、教等专业配备一定数量的专职编辑以及必要的行政人员”。这是教育部第一次对高校学报的综合性、内向性及学报编辑的专职性予以明文规定。这几个要点后来都得到了中央新闻出版管理部门认可,成为20世纪80年代确立的学术期刊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

^① 田卫平. 重“展示”轻“引领”:学术期刊发展的缺位[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4): 63-64.

^② 李频. 数字时代社科学术期刊改革路径的思考[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14, (4): 57-68.

从学报主编参与起草并较多吸纳了他们建议的教育部《意见》可看出，成为学术期刊的独立掌控者的确是主编们当时的真切愿望，在他们看来，告别学者身份以独立的编辑身份立世，是独立掌控期刊的前提，掌控得好也是可以引以为傲的。至于可能承担的风险，他们也有所考虑。在他们的建议下，《意见》特地写入了“编辑人员的职称、级别及其工作生活条件，均应按相应水平的教师办理”的条文。至于后来学报地位和编辑待遇每况愈下，编辑们拿着这个《意见》却无力回天，则是他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当时的他们，正信心满满地揭开了独立于学者的编辑身份重建的序幕，也就是前文提及的编辑学者化的“前传”。编辑学者化其实是在他们设计的“编辑中介说”和“编辑再创造说”于现实中屡屡碰壁后重建学报编辑身份的一次再出发，起因还是承续“前传”的职业化后必须重建编辑身份而来。

学术期刊的单位制也是编辑学者化热议的重要起因。单位制除了学术期刊由单位主办以外，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有限的刊号按单位分配，每个高校，不管科研人员多少，不管科研实力强弱和学术影响大小，都有一个且只能有一个刊号，即所谓“一校一刊”，高校学报就是最为典型的单位制期刊。单位制加上稿源的内向性和内容的综合性，结果只能是：主办单位的科研实力直接决定了所办期刊的学术质量和学术影响。可见，是体制而不是学术共同体赋予了单位的办刊权，其中为数不少的科研实力较弱的单位主办的期刊，特别是综合性学报，只能凭借体制的保护才能生存下去。所以，如果说学者化为编辑独立掌控期刊提供了依据，那么，单位制则为他们所掌控的期刊的合法存在提供了保证，故而学者化的持论者往往也都是单位制的捍卫者。

编辑引领学术话题的出现比编辑学者化晚了近二十年，但根子仍在编辑职业化。经过职业化以来这近二十年对学术期刊的独立掌控，不同的编辑有了不同的感觉，对此，原祖杰有精辟的分析：“理想主义者不愿意承认自己手中掌握着决定学者命运的权力，因为他们觉得那样是本末倒置，是对学术共同体的僭越甚至背叛”“带有现实主义倾向的期刊编辑首先会接受现实中的各种安排，包括对编辑身份的定位和不可抗的各种政策转变……面对自己掌握的学术权力则更为坦然，并试图积极主动地利用学术指挥棒发挥引领作用”。^①如果说学者化持论者希望通过提升自己来获得学者对其学术能力的认同，以避开僭越的嫌疑，还有点理想主义色彩；那么，引领学术持论者则肯定是一批现实主义者，他们丝毫没有学者化持论者面对期刊独立掌控权时那几分敬畏和惶恐，有的只是自信。

编辑引领学术的主张也与单位制密切相关。如前所述，在单位制下，决定期刊学术质量和学术影响的是主办单位的科研实力，这是绝大多数高校学报在引领学术话题刚刚被提起时根本不感兴趣的原因，20世纪末高校学报因一个“偶然的机遇”实现了空前规模的大扩容，^②但数量在极短时间内的剧增必然导致优质稿源的稀释，学报正经历着空前的声誉危机，此时谈何引领？引领学术的话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编辑首先提起，并不是偶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是中国科学院四大学部中的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科学院于1949年成立时是政务院的一个行政机构，承担的是全国科学研究领导者的责任。1955年正式建立四大学部后则成为“独立的学术研究和领导机构”，对于其所主办的期刊，刊发国内任何学者的论文都是天经地义的分内事。而事实上，稿源内向制也只针对高校学报，始作俑者便是教育部1978年的《意见》。到21世纪初，随着“以刊评文”量化评价的兴起，《中国社会科学》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期刊在各高校期刊榜上均已一骑绝尘，受到空前追捧。这并不奇怪，在单位制下，像中国社会科学院这样地位独特的主办单位不可能有任何竞争对手，既然“屠龙刀”在握，岂能没有“号令天下”的雄心？至于追随《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而力主引领学术的几家地方社科院社联期刊，其在各省市的地位也是超然和广受追捧的。相比之下，唯有抱着综合性、内向性不放的高校学

① 原祖杰.“编辑学者化”与中国学术期刊编辑的身份[J]. 澳门理工学报, 2018, (3): 130-142.

② 朱剑. 自缚与破茧: 40年来高校学报体制的演变——以人文社科学报为中心[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6): 1-14.

报作茧自缚,就连做着学者梦时也不敢越体制的雷池一步,即使到后来教育部和新闻出版署都不仅不再要求而且不断鼓励学报突破内向性后,捍卫内向性的声音也没中断过。

可见,编辑学者化和编辑引领学术,实际上是同源的,皆源自学术期刊的单位制和编辑的职业化,所不同的,只是办刊单位在学术界地位悬殊,所以目标高度也就不同。

五、两者同源、同质、同逻辑、同指向,不同的只是话语策略和姿态

学者化和引领学术给人最初的直观印象,就是两者皆为学术期刊编辑的自我赋能,当我们从以上四个方面对两者做了一些具体比较后则可看到,两者在更深的层面上的确还有更多的共同之处:两者的主体都是因编辑职业化而告别学者身份独立掌控了学术期刊的编辑,都面临着自身身份和与学者关系的重建,学者化和引领学术既是身份重建的目标,也是与学者关系的基础。二三十年来对这两个话题的反复言说,不仅是一种持续的自我激励,更是对关系建构中的另一方——学者接受这种编辑设计的双方新关系的不断游说,故而都将已是事实的对学术期刊的独立掌控作为言说的依凭,并视之为构建新身份、新关系不可变更的前提。

学者化与引领学术从表面看意思差异甚大,前者要的只是具有学者水准的职业编辑身份、与学者平等的关系,后者要的则是超越学者的职业编辑身份、与学者引领和被引领的关系。但实际上不仅两者构建新身份和新关系的起点都是相同的,看似不同的目标,实际上指向也是同一的,学者化不会是终点而只能是阶段性目标,它的逻辑结果必然是引领学术。诚如有研究者所形容的:“在明确学术编辑的学者化倾向(方)向后,一些有强烈进取心的编辑往往会意气风发地向更高目标前进,提出引领学术研究甚至引领学术潮流的口号,这成了学术编辑的‘将军梦’。”^①学者化就是先让编辑与学者平起平坐,再利用媒体和平台优势去吸引学者,如果再往前走一步,那可不就是“将军梦”的成真?这条看似低调的路,潜在目标可一点也不低,虽然曲折一些,但更有望走通。由此可见,两个本质相同话语姿态各异的言说,低调的学者化,话语策略其实更加高明。这也是两个话题圈子从形同陌路到逐渐走近,再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自然地就发生了一个原因。两者与其说殊途同归,不如说原本就是同一条路上的人,只是一个从起点出发,另一个略过了前半段直奔后半段而去,故而互不交集。后来,一个向前延伸,另一个向后回溯,于是相逢相知了。当然,都仅限于言说,也只有言说时才能任意选择起点和假想终点,在现实中,各自所立的“flag”因无法逻辑自洽,恐怕只能是一条永远也无法抵达终点的路,甚至要真正踏上这条路都很难。这一点,只需看看如今学术期刊编辑工作中耗费时间和精力最多的是啥,就能明白。

学者化和引领学术的声音虽然从没中断过,但始终都是编辑在说,却极少见到需要重建关系的另一方——学者的参与。可见,尽管编辑们说了几十年,但要学者心悦诚服地接受编辑单方面构建的新关系仍然是件极其困难的事。所以,编辑们大概还会反复地说下去。在笔者看来,学者们拒不接受,主要原因还在于这样的新关系没啥道理,一个离开了科研第一线、外在于学术共同体的职业编辑群体能够在学识和眼界上普遍与学者群体持平甚至超越他们,并为他们指引方向,在逻辑上讲不通。这一点,前文曾提及的学者化反对者看得更加清楚。他们明白,学者化、引领学术什么的,都是镜花水月,多此一举,只有单位制职业化体制不变,才是对编辑人员利益的最好维护,所以他们是更坚定的单位制和职业化的捍卫者。至于田卫平的“万金油”理论,更是勉强。如果说广泛掌握信息、媒体和技能就能充当引领者,那么,对于各行各业,掌握信息最多的大概都首推媒体人,就如一个优秀的足球记者,说起足球界的事来,无论是球员的特点风格还是教练的所思所想或球迷的欲望诉求,无论是历史上的成功战例还是足球理论的最新发展或某个国家和民族的足球传统,说起来无不如数家珍,头头是道,可又有哪家足球俱乐部会请他来当教练?如果“万金油”理论能够成立,那么,各行各业岂不都得由媒体人来领航?现实中有这等荒唐事吗?可为何学术研究偏偏得由编辑这个职业媒体人来引领?

^① 张慕华. 论学术编辑是否应引领学术研究 [J]. 出版广角, 2015, (13): 21-23.

其实，在引领问题上，柯锦华的论证是最严密的，她为引领学术的编辑制定了如下标准：“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引领，即一流学术期刊的编辑团队秉承优良的学术传统，拥有自己的研究力量和研究课题，已形成成熟的编辑思想和深厚的学术积累，其敏锐的学术判断力、训练有素的学术组织能力和较强的号召力，使其能够凝聚各方面的研究力量，有效地开展各种学术活动，策划具有前瞻性的选题，编发高水准高品位的文章。因而，这些一流的编辑团队能站在学术潮流的前沿，把握学术发展的脉络，引领学术的发展。”^① 让如此优秀的编辑团队来引领，学者们一定口服心也服，可笔者很怀疑，这样超出了凡人神一般存在的职业编辑团队，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的吗？

那就让我们来简单地回顾下学术期刊的历史，看看历史上优秀的编辑都在哪里。学术期刊的历史不算长，它的产生可简单地归因为两个条件的具备：其一是学术研究和学术组织发展到一定阶段，创建新平台的主体已然产生。标志是近代大学、专业研究机构、专业学会的诞生，专业学者群体的壮大，学术自由理念的确立，以及与之配套的学术体制的初步建立。其二是传播技术的突破，创建新型平台的技术已然成熟。标志是“‘古登堡活字印刷术’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扩散，撕裂了欧洲的社会生活结构，开了资本主义产业化的先河，并用新的生活方式将它重新组合，从而确立了全新的传播尺度”，^② 学术传播的尺度也因此到了刷新的时候。

17世纪60年代，这两个条件在欧洲都已具备，于是，最早的学术期刊应运而生。这种可供多位作者共同展示学术成果且连续出版的全新媒介，使得学术成果最重要也是最主要的展示形式——学术论文逐渐定型，并围绕学术期刊和论文衍生出一系列学术规范，从而对学术发展史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随着西学东渐，19世纪，学术期刊与现代学术、大学体制和学术自由理念等先后传入了中国。

不管是在原产地，还是在传入中国后，学术期刊的创建主体都是学术组织，主编、编委和编辑都是学界中人。这是因为，在上述两个条件中，技术固然重要，但表达和传播的学者群体的创新知识和理念，才是学术期刊价值的来源，所谓“内容为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也是学术期刊诞生后即对学术共同体的产生做出了直接贡献——既为其划定了边界，也是其中心——的原因，内嵌于学术共同体更是理所当然的。从表面看，决定期刊内容的似乎是主编、编辑，实际上是他们背后的学者群体，主编和编辑代表的是学术共同体的意志而不可能是学术共同体跟着主编及编辑走。在这样的学术期刊与学术共同体的关系中，前者是后者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相应的，学术期刊编辑也不可能是一个独立的身份，编辑首先是学者，是学术共同体的核心成员。所以，历史上不管多有名的期刊引领学术的案例，引领者都是学者，而他们之所以能够引领，也首先因为他们是优秀而有独到见解的学者，而不是其他。

六、结语：走出迷思，回归学术共同体

近二十年来，与编辑学者化和编辑引领学术一样吸引学术期刊编辑眼球的，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学术期刊体制的声音和动作。对于现行体制所造成的学术期刊的种种“体制病”，不仅学术界和期刊深有感受，管理部门也早已充分意识到，比如作为改革先声的教育部名刊工程2004年启动时就明确抛弃了作茧自缚的学报稿源内向制。2011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深化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的意见》对于“体制病”的表现和根源说得很清楚：“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的现行体制制约了报刊出版业发展，存在数量过多、规模过小、资源分散、结构不合理、市场竞争力弱等突出问题……迫切需要深化改革。”^③ 但在此后的实际运作中，学术期刊改革却非常艰难，特别是学术期刊的布局、结构及与学术研究和学者的关系问题，牵涉方方面面，并非2012年那种以“转企”为手段的疾风骤

① 柯锦华. 学术期刊编辑三境界：从旁观者到引领者 [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3-07-12 (A06).

② 张耀铭. 数字时代印刷媒介的危机与变革——基于传媒历史的视角 [J]. 理论与改革, 2022, (4): 18-35.

③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深化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的意见 [Z]. 中办发〔2011〕19号.

雨式的改革所能奏效的。

2019年,中科协、科技部、教育部等多部委联合发布《关于深化改革 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昭示了学术期刊改革的新路径,那就是现有期刊改革与另起炉灶同时推进,每年拿出几十个刊号来创办新刊,为此专门启动的“卓越行动”,如今已走入第四个年头。只要看看“卓越行动”几年来所创新刊的模式,也就知道老刊及其编辑该走怎样的路径。这些新刊,几乎无一不是专业期刊,无一不是以优秀学术团队为核心而创建,无一不是以著名学者为主编、前沿学者为编委、专业学者兼任编辑。其实,这些新刊完全不同于现有期刊的办刊模式,与其说是创新,不如说是回归,而这种以新刊示范和带动老刊的改革路径,不啻温水煮青蛙,老刊若仍然不为所动,那么,随着数量上的此消彼长,用不了几年,就都该被新刊挤出学术传播领域了。

由此观之,试图通过编辑学者化或编辑引领学术重建编辑与学者的关系,固然因其既难以逻辑自洽也不可能抵达终点的空想性而难免成为镜花水月;而无视期刊、编辑与学者的疏离,一味固守编辑职业化和对学术期刊的掌控权,以为就此一劳永逸,恐怕也多半是徒劳,因为他们手中的期刊必将越来越难在学术传播领域立足。所以,唯有走出学者化和引领学术的迷思以及对期刊独立掌控权的迷恋,回归学术共同体,才是编辑和仍掌控于其手中的学术期刊的根本进路。

Editorial Scholarization and Editorial Leading Academia: Two Types of Empowerment, Same Direction

ZHU Jian

(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Editorial Department, Nanjing, Jiangsu, China 210000)

Abstract: Scholarisation and academic leadership are both self-empowerment of academic journal editors, but they have more in common at a deeper level; both are driven by the professionalisation of editors, leading to the abandonment of their scholarly identity and independent control of academic journals. Both face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ir identity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scholars, and scholarisation and academic leadership are both the goal of identity reconstruction and the basis of the relationship with scholars. In other words, they are not only self-motivating, but also persuading scholars to accept a new relationship designed by editors. Thus, they both rely on the established independent control of academic journals as the basis of their discourse and consider it as an unchanging premise of their new identity and relationship. In fact, the new identity and the new relationship that both are building have not only the same starting point, but also the same, seemingly different, goal. Scholarship can only be a stage goal, and its logical outcome is academic leadership. Instead of saying that they are on the same path, it is better to say that they are originally on the same path. From the fact that the “flags” set by each cannot be logically self-consistent, it can be seen that this is a road that will never reach its end. Therefore, the only fundamental path for academic journals and editors is to return to the academic community.

Key words: editor scholarisation; academic leadership; academic journal; editor professionalisation; editor identity

(责任编辑:杨 恬)